



DOI : 10.6256/FWGS.201810_(109).12

「亞洲酷兒比較研究工作坊」 活動紀實

文 | 張峻臺 | 國立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執行編輯

圖 | 國立臺灣大學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提供

由國立臺灣大學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亞比中心）主辦、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協辦的「亞洲酷兒比較研究工作坊」，於2018年4月14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行。工作坊邀請到四位東亞跨國比較研究的學者進行分享，分別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Denise Tang（鄧芝珊）、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人類學與性別研究學系教授 Sara Friedman、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Travis Kong（江紹祺），以及美國南加州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Minwoo Jung。工作坊目的是企圖從亞洲跨國的同志研究中，獲得方法學、理論框架與在地脈絡的學術貢獻，以補充現有以歐美作為研究對象或理論基礎的不足。



亞比中心藍佩嘉主任首先介紹中心成立的首要目標，在於從亞洲比較研究中提出跨國、跨社會、跨文化的觀點，並試圖了解臺灣在全球的脈絡中，如何與跨亞洲國家產生相似、差異與關聯性。LGBT 運動近幾十年來在臺灣有重要的進展，但同時也遇到諸多反挫力量，藉由這場工作坊，得以讓我們將臺灣與東亞各國社會現況進行比較，包括人們的跨國移動、法律政策、文化與認同、資本與商品、

主 講 | Denise Tang |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Sara Friedman |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人類學與性別研究學系教授
Travis Kong |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Minwoo Jung | 美國南加州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主 持 | 吳嘉苓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紀大偉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藍佩嘉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評 論 | 胡郁盈 |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陳伯偉 |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主辦單位 | 國立臺灣大學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 | 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

時 間 | 2018 年 4 月 14 日 10:00~17:00

地 點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8 室

Denise Tang (鄧芝珊) 老師



宗教等交互作用，都對這些國家當中的同志運動或粉紅經濟、反同志運動產生了不同面貌的影響。

一、婚姻平權與酷兒家庭

第一場「婚姻平權與酷兒家庭」專題討論的主持人吳嘉苓老師首先表示，近年同志婚姻運動和家庭的組成結構，在臺灣引起了許多注目；但是，較少跨國比較研究，因此很榮幸能見到兩位講者開創的發表。鄧芝珊老師鑽研過香港女同志空間與移動的議題，此次她以日本、香港和臺灣婚姻平權為題進行演

講。Friedman 老師曾出版多本專書，研究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的親密關係政治；在這場工作坊中，她將討論同志作為父母如何創建親屬關係。評論人胡郁盈老師，長期投入於女同志政治、跨國視角和酷兒生殖研究。

(一) 日本、香港和臺灣的婚姻平權

第一位主講人鄧芝珊老師，她與日本法政大學 Diana Khor 老師、世新大學陳宜倩老師，以「全球規範、國



家治理和在地運動：日本、香港和臺灣的婚姻平權」為題進行研究，指出這三地的性少數公民權如何與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歐美人權標準產生關聯，以及婚姻對此三地受訪者的意義為何，最後分析近年與未來東亞舉辦的國際運動會，提出 LGBT 運動如何與之結合，在世界舞臺上擁抱國際標準。

在研究方法與理論方向上，鄧老師參照了多位學者提出的亞洲轉向，例如 Koichi Iwabuchi 指出亞際研究能催生「創新知識生產」、陳光興提及「亞洲作為方法」，以及 Helen Hok-Sze Leung 和 Audrey Yue 進一步採用「酷兒亞洲作為方法」。鄧老師認為應看到日本、香港和臺灣的異同之處與政治經濟文化的脈絡，以及三地交互連結的關係；在各自的文化脈絡、家庭傳統等位置之下，如何與歐美潮流的婚姻平權制度協商？以華人儒家文化為例，組成家庭在傳統上是象徵人生進到下一個重要階段，臺灣和香港的許多受訪者也認為結婚是滿足家庭的期待，生育小孩和組成家庭能對家庭負責；日本則是認為結婚與社會認可有更大的關聯。因此在推行同婚運動的同時，也得看到亞際各國文化對於婚姻的意義為何。

此外，這三地推行與累積了不同程度的 LGBT 相關政策與進程，例如日本

與臺灣已有許多區域可進行同性註記、香港近年也有多起和跨國同性伴侶有關的權益案件。臺灣自 1990 年代婦女運動以及後續興起的同志運動以來，已累積諸多豐富討論；2017 年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解釋也即將生效。鄧老師的報告進而連結了這三地的社會、文化、政治與媒體論述，指出香港的受訪者將臺灣作為模範指標，認為臺灣擁有較完整的民主和性公民權；臺灣則受到日本次文化同志漫畫的影響，將次文化展現於同志相關的運動與活動之中；而日本將在 2020 年舉辦東京奧運，國內外對於能否朝向婚姻平權的國際標準也提高了關注。

鄧老師表示，隨著歐美婚姻平權的影響，這三地的現代性有所差異但也有所連結地被形塑。無論是盛大的同志婚禮或國際運動賽會盛事，都有機會促使社會議題被討論。過去邊界政治與地緣政治較勁的可能是軍事實力，但可看到近年東亞各地對於人權標準的討論與交互影響，也產生了諸多重要性。另外，婚平運動同時伴隨的討論也包括「同志國族主義」（homonationalism）和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對於婚姻制度的批判，相關論述與受訪者的敘述也在研究中有所呈現。

（二）兩岸同志父母創建親屬關係的策略

第二位講者 Friedman 老師以「創

Sara Friedman 老師



建親屬關係 與家庭認同： 臺灣和中國大陸 同志父母的策略」

為題進行演講。她的研究企圖探討以各種方式生育後代（如代理孕母或人工授精等），並成立新形態家庭的中國大陸城市和臺灣的同志父母，如何追求社會或法律上的認可，以及如何在缺乏法律的正式關係中，努力創造一個安全的家庭？最後，並提出這些浮現的新家庭組成，帶給華人社會怎樣的親密關係與家庭倫理的實踐與啟發，以及新型態家庭如何／是否動搖了異性戀規範裡親屬關係的核心價值？

Friedman 老師以兩大軸線討論同志父母親屬關係的建立：生物遺傳策略、法律策略。生物遺傳策略部分，近年來國際間的輔助生殖技術（ART）帶動了部分同志父母前往歐美或東南亞國家，進行商業代孕。其中 ROPA（reception of oocytes from partner）是不少臺灣女同志伴侶選擇的一個生殖科技實作，亦即有意識的採行「A 卵 B 生」模式。這樣的生育模式，除了有性別認同的原因（例如女同志當中的 T 較難忍受自己懷孕的樣子，但同時也想擁有孩子），也有未來導向的考量（例如共同參與生殖過程的經驗，能加強與孩子的情感連結）。以及，在臺灣目前只承認「生母」

的法律下，至少對於提供卵子的母親，在未來若遇到重大事變時，可能還有親權的依據。

對於中國大陸男同志伴侶的遺傳策略而言，其中有受訪者採取「伴侶混合精子」並且不檢驗孩子 DNA 的方式，使得兩位爸爸在理解上都是孩子的遺傳父親。或者，伴侶間分別與同一位卵子捐贈者採行人工生殖，如此一來兩個孩子之間就能成為具有血緣關係的兄弟姊妹。以上多種不同的例子，都顯示出隨著生殖科技的發展，新的家庭與血緣關係形態正在改寫，形塑同志父母與孩子間的緊密連結。

同志成家的另一個重要方式即為法律策略。在上海，戶口制度攸關資源分配，因此就有男同志受訪者考量明星學區因素，而將有血緣關係的孩子過戶給伴侶（其戶籍所在的學區更具競爭力）。或者採用形式婚姻、私人醫院與戶口轉移等技術，以建立一個擁有法律關聯的家庭關係。在臺灣，雖然絕大部分縣市已可進行同志伴侶註記，但對於伴侶間或組成家庭的實質權益保障仍低。因此，同志與小孩之間常需要另外藉由委託監護、寄居與戶籍登記等方式，才能達到保障。

Friedman 老師指出，雖然生殖科技使得同志伴侶能以不同方式建立新



生物關係的家庭組成，但在兩岸的例子中，這些科技反而加強了同志父母對於孩子血緣的追求，換句話說，代際間的血緣關聯同樣對同志家庭產生重要的影響。此外，在兩岸目前缺乏正式法律制度對於同志家庭的保障下，我們仍能見得這些父母如何透過各種其他的法律策略，努力創建伴侶間與小孩的法律關係。

（三）回應與建議

回應人胡郁盈老師指出這兩份研究都是很有前瞻性的酷兒家庭比較研究。跨國的性別研究時常提醒我們要跳脫西方同志政治的視角，而應加強區域之間的文化、知識論、主體生產的互相影響，也包括當地與全球的物質和象徵意義之關聯。在這個部分，兩位老師都提出了很好的論述，看到亞洲這幾個國家的文化相似性和政治相異性。特別是有兩大軸線貫穿了這兩份研究，一是對於現代和傳統的辯證關係，也就是全球化的同婚倡議如何與傳統家庭與親屬結構產生關聯。二是對於酷兒家庭的討論，究竟全球化的同志政治是否或如何影響主體認同，以及新型態家庭的概念。

在建議的部分，胡老師以自己的研究為例，過去常用現代與傳統的框架，來談同志很難在華人家庭中現身，

但她發現當代臺灣反而能用「單身不婚」的女性形象，以及「未婚女兒」提供的親屬責任，成為女同志在面對家庭與認同時的協商策略。此外，對於形式婚姻的差異，胡老師認為中國大陸男同志採用此法也包含了對於成家和育兒的想望；但臺灣大部分的女同志們，則認為形式婚姻並不可取，不認同雙方建立一個偽異性戀的婚姻生活。她們是為了取得人工生殖的合法條件而採行之，並在受孕後隨即與異性離婚。換句話說，形式婚姻對於兩地男女同志的意義有很大的不同，一邊是與之協商以滿足親職與社會期待，另一邊則是當成暫時的通行方式。因此，綜上兩例，若能在社會變遷造就的轉型和不同適應脈絡下，複雜化同志認同和華人家庭的概念，將會對研究的深度更有幫助。

二、同志認同與彩虹企業

下午「同志認同與彩虹企業」專題討論的場次由紀大偉老師主持開場，他為兩位講者提供詳細介紹：江紹祺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專長為媒體和性別研究，曾出版 *Chinese Male Homosexualities: Memba, Tongzhi and Golden Boy* 以及《男男正傳：香港年長男同志口述史》等書。Minwoo Jung 目前為美國南加州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同時也是南韓延世大學文化人

類學系的訪問學者，投入於南韓、臺灣與新加坡的性治理研究，並有一篇收錄在國際期刊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的學術論文（Precarious Seoul: Urban Inequality and Belonging of Young Adults in South Korea）。最後由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陳伯偉進行回應，近期的研究領域為障礙者的情慾、親密實作與性治理。

（一）中港臺年輕男同志身分認同

江紹祺老師的研究題目是「香港、臺灣、中國大陸年輕男同志身分認同的跨地研究」，他結合了社會學和酷兒理論並採用深入訪談的方式，研究了這三地各 30 名介於 18 到 28 歲的男同志。在這群 90 後的年輕男同志世代，所在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脈絡已和過去的同志已有所不同，究竟我們要用什麼模型才能去理解這些非西方的男同志？他們怎麼理解身分認同？是江老師要研究的主題。

Travis Kong
(江紹祺) 老師



Minwoo Jung 老師



1950、60 年代西方社會學界探討同性戀，多以偏差研究與污名概念來討論社會互動，隨後也有社會建構論或本質論兩種不同取徑。1990 年代崛起的酷兒理論則超脫兩種取徑，重新思考身分與社會關係的聯繫，看到性／別、階級、種族、民族等軸線的交互影響所產生的規訓及解放效果，產生多重、開放、混合或不斷變換的身分。但過去大部分的研究看到東／西兩方的交錯，較少以亞洲內部之間的視角來討論問題，因此江老師以陳光興的「亞洲作為方法」、Iwabuchi 的「亞際作為參照」，並連結社會學與酷兒理論，作為理論背景和研究方法。

江老師的研究指出，隨著 1949 年兩岸政局的演變、香港的殖民背景、臺灣的民主轉型，造就三地政治文化的不同，並影響身分認同。臺灣年輕男同志視臺灣的同志運動是東亞民主化、國際人權發展的重要指標，因為中國大陸對於人權與臺灣主權的政治議題，使得這些臺灣年輕男同志的認同開展出獨特的同志國族主義。

香港和中國大陸在 1990 年代相繼將同性性行為去刑罰化，同志開始有相關的消費文化，加上同志運動組織的興起，也增加了男同志的身分認同。但香港年輕男同志認同常困於中國大陸和臺灣的拉鋸之中，他們對於臺灣的民主發

展有所憧憬，政治現實上卻常受到中國大陸當局介入，因而對於香港的同志人權與法律發展較為悲觀；另外在對於中國人的情感上，又沒有如許多臺灣年輕人般的強烈分離意識。



中國大陸的年輕男同志則對於中國人的身分略顯尷尬，一方面驕傲於進步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則羞愧於民主與人權的不足。但整體來說，他們對於經濟發展帶動政治的多元化，仍保有一定的樂觀程度。此外，因為中國大陸政府對於人權組織的管控，因此相關的同志倡議團體如「同性戀親友會」則繞道發展出一套以儒家為核心論述的倡議模式，強調愛、勇敢、責任與照顧，以作為同志社群及親友之間互相包容與提倡社會能見度的方式。

綜上所述，以亞際之間的參照研究，可以見到男同志的身分認同不只是受到西方化的影響，也揉雜了在地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發展，並且相互產生關聯。江老師期待這樣的研究資料以及研究方式，能幫助未來的酷兒與社會科學研究，納入更多亞際地區的參照，勾勒出更為豐富的研究地圖。

（二）亞洲企業公民

下午第二位講者 Jung 老師，以「亞洲企業公民的出現」為題進行演講。他研究南韓、臺灣、新加坡三地的商業機構與 LGBT 公民權的連結，指出新的一條非直接與國家政策體制鑲嵌，而是透過市場關係來開發邊緣群體公民身分的道路。

在南韓，由同志友善的律師和研究者發布的性少數友善工作環境相關報告，指出大多數的同志在職場上皆會面臨噤聲與歧視的環境，並缺乏友善的支持系統——超過 85% 的 LGBT 職員並未在職場上出櫃，亦有超過四成的 LGBT 職員曾遭受因為性傾向或性別特質的職場歧視。因此他們希望能藉由推廣企業友善指南，以縮小與國際標準的差距；但比較有可能將「包容性政策」寫入企業規範的都是跨國大型企業（例如 Google、Facebook、IBM 公司），

要促使當地的財閥家族企業執行，恐怕還有一段距離。除此之外，形式與實務上也有所落差，例如雖然 Samsung 在企業運作規範「平等與多元」篇章，有明文不歧視每個人的性傾向與性別認同，但幾年前仍舊發生當跨性別職員要請病假去執行性別重置手術時，遭到公司刁難的情況。

此外，南韓的公民團體有濃厚的反商情結，例如近幾年的首爾同志遊行，主辦單位的態度較為強調鼓勵個人捐款，或接受小型獨立店家的贊助。大型企業如 Google 的贊助，會引起基進團體對於「親商」和「與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合作」的疑慮。綜上兩大軸線：財閥企業缺乏對性少數的支持、公民團體反商的文化，使得南韓的 LGBT 職場友善政策要受到實質關注，或是欲使企業與公民團體的合作，都仍存在重重難關。

在臺灣，同志諮詢熱線於 2017 年發布的臺灣同志人權政策檢視報告，當中不僅敦促政府與企業應遵守性別工作平等法，更進一步指出，應建立職場多元性別友善指標、建立相關申訴機制，以及政府輔導創業計畫時應融入多元性別平等觀念。這些對於工作場域的權利要求，並非偶然，事實上在近幾年，許多跨國企業已持續推行內部政策，例如對員工有關伴侶的

福利擴及到同志伴侶，並且以企業名稱參加同志大遊行。除了對內的政策與福利，在對外消費者的行銷上，也已開始注重「粉紅經濟」的效益，例如臺灣麥當勞推出出櫃與親人支持的廣告影片，也有越來越多中小企業如咖啡館、餐廳和書店，標榜同志友善。

Jung 老師參酌相關研究，表示臺灣的公民－企業合作文化，使得臺灣的 LGBT 友善企業能與非政府組織保持重要的合作關係。企業不僅僅只是「贊助」而已，而是能從社群與價值共享的關係中獲得利益，改變了傳統不平衡的「捐助－接收」關係；公民與企業合作的崛起，也模糊了傳統分類中，公民社會與市場區隔的界線。

最後是新加坡，因為有優渥的地理位置，作為東南亞最重要的金融與商業中心的樞紐，吸引了全球資本與跨國勞動力聚集，使得這些歐美跨國公司的內部政策到了當地仍能保有相當的自主權，以滿足數十萬的外籍勞動者及其家庭。例如公司對於 LGBT 員工的社會權利、醫療保健、育兒與探親、性別重置手術等的福利措施與補貼。在這樣的條件下，對於許多人的身分而言，重要的不是有沒有取得國家的公民身分，而是能不能被公司錄取，成為公司的員工。Jung 老師將其稱之為「企業公民」，透過成為企



業的員工，而不是通過國家政策的途徑，享受企業所提供的種種福利。

因為新加坡的刑法第 377A 條依舊不允許男性間的性行為，因此有受訪者稱之為「這是一個第一世界的城市，美麗而華麗，卻有著第三世界的權利。」在這樣的情境下，上段所言的公民權利，幾乎只能侷限於企業場域之內，企業成為安全的避風港。一旦離開辦公室，仍須面對外面的影響。但縱使如此，這些企業仍努力與同志社群組織者定期舉辦內部交流與聯誼活動，並成立許多聯盟團體，分享訊息與討論行動策略。

（三）回應、建議與綜合討論

回應人陳伯偉老師首先肯定了江老師揭示了「中國」同性戀身分的三個獨特但相互參照的經歷，超越「全球同質化」和「地方本質主義」的區分。他進一步建議，雖然演講中看似將臺灣作為進步的燈塔，但其實臺灣家庭傳統充滿矛盾、緊張與衝突；中國大陸看似善用儒家宗旨作為論述策略，但雙面刃即是「含蓄美學」所造成的壓力與困境。這些複雜化的傳統與非傳統，彼此交纏在一起，可進一步加以分析。

另一方面，Jung 老師透過跨國比

較研究，提出了一條「企業公民」的路線，看到市場和企業公民身分塑造了亞洲的 LGBT 運動，這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貢獻。陳老師建議，目前的版本認為南韓的企業環境是最不友善的，但是否有任何應對策略或抵抗空間的可能？此外，雖然文中以南韓與臺灣對於公民團體與商業合作的差異，指出臺灣的粉紅經濟成為雙贏的結果，但事實上，既有文獻對於粉紅經濟亦已有諸多關於消費與文化面向的批判。以及，新加坡的企業公民權存在的特定社會階層關係，也是未來在研究發展上，能夠納入批判與討論的範疇。

在綜合討論中，主持人藍佩嘉老師提出了兩個問題，分別是「從亞洲酷兒比較觀點中，能提供哪些重要的課題？」，以及「在進行亞洲社會的酷兒比較研究中，有哪些方法學上的挑戰？」Friedman 老師認為，比較研究的好處是可以超越界線，例如超越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或是性傾向的分類，而去思考使用何種解釋概念能跨越對立。她也很開心在大家的演講中，看到了跨文本的交互影響。江紹祺老師接著提出思考問題：當我們在挑戰歐美主流理論模型時，亞洲作為方法要怎麼避免本質化的問題？是否會變成另一種亞洲主義？另外，在學術產製過程中，既有的論文傳統架構和國際期刊都已經設定好規則，而亞洲研究或比較研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Global Asia Research Center

Queer Asia Comparative Studies Workshop 亞洲酷兒比較研究工作坊

2018年4月14日 (14th Apr.)
10:00-17:00

* 本場為公開講座：以英文進行，歡迎報名參加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8 室
Room 108,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TU

Time	Events
10:00-10:10	Opening Remarks Pei-Chia Lan 藍佩嘉 (Director, Global Asia Research Center, NTU)
10:10-12:00	First Panel: Queer Family and Marriage Equality Presider: Chia-Ling Wu 吳嘉苓 (Professor, Sociology, NTU) Discussant: Yu-Yin Hu 胡郁盈 (Assistant Professor, Gender Studie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Global Norms, State Regulations and Local Activism: Marriage Equality in Japan, Hong Kong and Taiwan Denise Tang 鄧芝珊 (Senior Lecturer, Sociology, HKU)
	Creating Kinship, Recognizing Families: Strategies of Lesbian and Gay Parents in Taiwan and China Sara Friedman (Professor, Anthropology and Gender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13:30-15:20	Second Panel: Gay Youth and Queer Consumerism Presider: Ta-Wei Chi 紀大偉 (Associate Professor,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iscussant: Bo-Wei Chen 陳伯偉 (Associate Professor, Applied Sociology, Nanhua University)
	A translocal study of young gay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ravis Kong 江紹祺 (Associate Professor, Sociology, HKU)
	Purchase of Rights: The Emergence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 in Asia Minwoo Jung (Ph.D. candidate,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5:40-17:00	Roundtable Discussion Presider: Pei-Chia Lan 藍佩嘉 (Director, Global Asia Research Center, NTU)

Organizer/ 國立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

Co-organizer/ Women's Research Program,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Gender Studies, NTU 台大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

工作坊流程圖

究，則希望能試圖挑戰和相互影響這些生產知識的過程。在研究方法上，他認為比較研究中要找出差異相對簡單，但這些差異如何相互影響、怎麼解讀？就是研究的重要之處。

鄧芝珊老師認為，從比較研究中收穫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去了解不同研究地區的歷史，例如日本對於家的文化，與香港和臺灣的概念就很不同。另外，過去的研究引述的幾

乎皆是英文文獻，而如今亞洲也開始能自己生產出當地脈絡的知識。Jung 老師分享了比較研究時遇到的挑戰與收穫，包括不同學科會用不同標準檢視他的研究方法。此外，不同地區有不同文化的報導人，他多次轉換了不同的田野勞動，令他印象深刻。最後，雖然學術界在談亞洲作為方法，但其實很多 NGO 組織早已在進行了，例如互相參照各國的經驗、相互

比較與進行交流，並發展出當地的執行模式或運動策略。

「亞洲酷兒比較研究工作坊」在講者一整天精采的研究分享、評論人扎實的回應，以及觀眾踴躍的參與中圓滿落幕。期許亞洲酷兒比較研究，透過這些努力付出的研究者，用這些研究資料與基礎，繼續在知識與社群中，提供重要的研究發現與貢獻。